

重复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

杨培鸿*

摘要 本文首先定义了重复建设，认为只有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才有可能重复建设。接着，我们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寻租存在与否对投资量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投资量低于社会最优量，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从中我们还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认为重复建设并不等同于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完全可以在总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发生。

关键词 重复建设，寻租，委托—代理模型

一、已有研究

重复建设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的产生应该是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一个较为一般的定义是认为重复建设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93年以来经济结构中某些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的特定现象的称谓(卫新华，2003)。因此，重复建设并不单单是指对项目的复制，而是指对某些项目的过度建设。但是，研究人员一方面认为重复建设是指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一国总体生产能力出现过火、生产设备闲置的现象(魏后凯，2002)，另一方面又认为重复建设是中性的(曹建海，2002)。他们认为重复建设是有好坏之分的，合理的重复建设是指“由于市场需求的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生产能力过剩，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是指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体制不完善，投资者在较低水平上盲目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我们认为对重复建设的这种界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的、信息充分的、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进出没有成本的市场上，生产的不足和过剩才不会出现，此时也就没有必要分析重复建设。但是，这种状况只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这就说明在现实中，生产的过剩或者不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只在中国才那么突出呢？显然，上述的定义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其次，正如上分析，实际上投资者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约束，这使得投资对最优位置的偏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什么重复建设在

* 天则经济研究所。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阳光华橡树园11楼A4-901，天则经济研究所，100089；电话：(010)82571564；E-mail：yangpeihong@unirule.org.cn。本文作者感谢茅于軾、张曙光、盛洪、杨立华、S. Kennedy、杨爱华、田大山、方卫华、闫洪琴、马建臣的帮助和有益的评论，特别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对本文的评论。但是文责由本文作者承担。

中国的危害是如此之大呢?上述定义并没有区分对最优位置的常态偏离和重复建设之间的差别。在我们看来,投资对最优位置的偏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重复建设并不只是简单地对最优位置的偏离。重复建设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退出成本将会非常大。

然而,问题产生了:如果按照上述的定义,重复建设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经济(Qian, 1998),他们认为重复建设是竞争的基础。如此一来,重复建设似乎本身就是一个是非体。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两类对重复建设的定义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出资主体的变化。如果是单纯的个人投资行为,无论他怎样去投资,风险收益和成本都是重要的决策变量。也就是说,单纯的个人投资是没有多少外部性的,个人是可以内部化相当大一部分机会成本以及投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的。而且这种损失往往是局限条件下的最优,即在同等损失的前提下,个人投资造成的损失是最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来说众多的投资的确是保证竞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理论也是没有冲突的:投资的超额利润都会趋于零,而且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会相等的。所以,对私人投资来说,投资尽管不完全是多多益善,但是,投资的风险是可以较为充分地内部化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行政的手段来解决。然而,对政府来说,尤其是计划体制下的政府来说,政府投资不光是用来调节经济周期的,它还似乎是此类政府的一个天生的职能,科尔奈(1980)在短缺经济学中就做了很好的分析。因为调节经济周期的政府投资应该是逆周期而动的,但是统计数字显示在我国政府投资往往是单向增加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应该谨慎了,因为政府的钱是来自税收的。它投资的成败是有很强的外部性的,这个外部性还不光是来自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还来自于投资失败后的关联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投资失败,不光是政府本身的成本,公众也会面临成本。但是,在中国,政府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投资偏好,而且,政府的投资偏好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去控制其投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重复建设问题就突显出来了。

那么重复建设和寻租有关系吗?一个直觉就是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事实上,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首先,什么叫租呢?租在经济学上又叫经济租,是一项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了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只要信息和流动性的不对称阻碍着资源的流动,就存在租金。只要有租金就会存在着寻租行为(谬勒, 1999)。寻租行为就正是追逐这一超额利润的行为。寻租理论的思想起源于塔洛克在1967年(Tullock, 1967)的一篇论文,后来由克鲁格(1974)作为一个正式的理论提了出来。从那以后,寻租分析被正式地纳入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各种有影响力的论述也开始出现(Bardhan, 1997)。后来,经济学家们对寻租行为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性质的不同分成了寻租(rent-seeking)行

为和寻利 (profit-seeking) 行为 (陆丁, 2002)。寻租行为是用来描述那些维护既得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 而寻利是指那些并不以侵害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 比如企业家成功地开发新技术或者新产品, 从而使得该企业能够享有其他企业不能享有的超额利润等等。应该说, 寻利活动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体现, 是能提高社会福利的。

那么, 寻租是否就一定会阻碍社会福利的提高呢? 也不一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 在转型社会中, 寻租行为可能会有提高效率的作用 (Leff, 1996)。因为在这些国家, 制度安排往往是反效率的, 人为地设定了许多不合理的管制。此时, 通过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就能很好地规避这些反效率的措施。对社会来说, 这是完全有可能提高净福利的, 这也是所谓的生产性寻租。认为寻租是对价格被低估了的服务的补偿, 它能重建价格体制和促进资源分配效率 (Liu, 1996)。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也认为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增强竞争的润滑剂 (Posner, 1975), 就连布坎南 (1983) 本人也认为寻租行为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之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寻租只是有可能导致浪费, 他对寻租活动可能导致的浪费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当然,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此种观点持批评意见 (Murphy, 1993)。

地方政府之所以能从事这些寻租行为, 一些经济学家 (张曙光, 1994) 认为这是公益决策和具体决策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认为只要存在着公共决策, 就存在着外部性, 也就存在着决策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背离, 这就是发生寻租的客观基础。因此, 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两种社会不会发生腐败, 一类是社会的全部决策是私人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没有了公共决策, 自然就不存在公共决策与私人利益的矛盾; 另一情况是社会的决策全部都是公共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取消了私人决策和私人利益, 也就不存在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矛盾, 寻租也就不能发生。这种假说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它至少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大致相当的不同社会里, 有的腐败多, 有的腐败少, 这种理论也并不能很好地揭示寻租和重复建设之间的关系。

和这种假说相应的是一些学者看到了预算约束软化导致的后果, 这就是经常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理论。软预算约束理论是科尔奈 (Kornai, 1980) 在分析中央集权国家经济时候提出来的, 他本来是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绩效的, 因为在这些国家里, 有的企业已经处于破产地位, 但是政府不停地注入资金, 从而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但是软预算约束理论比较模糊, 因为它不能解释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赤字财政政策。

后来, 顺着这一思路, 一些经济学家 (Maskin, 1999; Huang and Xu, 1998) 认为软预算约束和多重出资人的存在分不开。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认为软预算约束是内生于时间的不一致性的 (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95), 他们认为国家或者出资人之所以愿意继续投资于一个不盈利的企业是因为继续

出资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但是,这种思路只是提出了一个结果性的解说,或者至多是对现象的描述,并没有考虑到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更没有考虑到制度安排。与此同时,林毅夫等(Lin and Tan, 1999)认为软预算约束是来源于政府官员行为面临的约束度低。

本文采用了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把中央政府设定为委托人,把地方政府设定为代理人,假定所有投资额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分配,地方政府只是进行如何投资的决策。并且假定中央政府是无私的,不会进行寻租,也不会与地方政府串谋。当然,这个模型可以推广。我们可以设定地方政府为委托人,政府招标项目的中标单位为代理人,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只考虑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的情形。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以及文献综述。在这一部分里,我们粗略地给出了所分析问题的背景。第二部分,我们给出在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地方政府的最优投资水平。我们考察了在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有无寻租的情形下,最优的投资水平。当然,相当于在一个理想的、信息充分的、无寻租的完全合约的情形下,信息不对称和寻租活动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分配水平,从而使得基于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下的投资水平为次优投资水平。第三部分,我们给出了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一个两难选择:中央政府必须在提供足额的投资和投资的低效之间进行选择,并得出了重复建设有可能和投资不足同时存在的结论。第四部分为结束语。

二、投资水平的决定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在判断一笔投资是否是在重复建设的时候首先就要看其投资主体,如果是私人投资也就无所谓重复建设了。但是如果是政府投资就有可能重复建设,因为政府在投资时面临的约束和私人投资的约束是不一样的,约束的不同使得政府投资的效率丧失了制度性保障。而这种区分的根源在于这笔投资的负外部性可不可以内部化。如果投资没有负外部性,那么这笔投资肯定就不是重复建设;如果有的话就有可能重复建设。换句话说重复建设应该是针对政府投资来说的。

那么,对一个社会来说,它的投资的理想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为了简化,我们假设两级政府,一级是中央政府,其他层级的政府都被当做是地方政府。我们假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边际成本为 $\theta \in \mathcal{D} = \{\underline{\theta}, \bar{\theta}\}$,其中投资效率高的地方政府的边际成本为 $(\underline{\theta})$,投资效率低的地方政府的边际成本为 $(\bar{\theta})$ 。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即使是对相同数额的投资于相同项目的投资来说,地方政府在实施投资的时候所需要的边际成本也是不一样的,高效率的地方政府将会更容易完成投资,而效率比较低的地方政府就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完成同

样的投资。对两类不同的地方政府来说，高效率的地方政府的实际投资额为 (\underline{I}) ，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额为 (\bar{I}) 。我们假定作为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S=S(I, r)$ ，其中 I 为投资额， $r \in (0, 1)$ 为寻租率。对中央政府来说，投资额和寻租发生的情况都对它的效用函数会产生影响。虽然中央政府是无私的，但是地方政府不一定是，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我们假定地方政府的拟线性效用函数为 $U=(1+r)t-C(I, \theta)$ ，并且 $c_{I_1} > 0, c_{\theta} > 0, c_{II} > 0, c_{I\theta} > 0$ ，因此， $\frac{\partial C}{\partial \underline{I}}=C_{\underline{I}}=\underline{\theta}$ ， $\frac{\partial C}{\partial \bar{I}}=C_{\bar{I}}=\bar{\theta}$ ，并且假定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报酬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另外一部分是来自相当于转移支付的一个比率。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不同类型地方政府的无差异曲线不相交，我们引入被称为单相交性质的斯彭斯—米尔利斯条件 $c_{I\theta} > 0$ 。作为回报，中央政府提供一定的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我们假定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的回报为 \underline{t} ，给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回报为 \bar{t} 。

在一个信息充分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所以中央政府可以提供完全契约满足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 \underline{t} ，所完成的投资是 (\underline{I})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为 \bar{t} ，完成的投资额为 (\bar{I}) ，即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一组契约 $\Gamma=\{(\underline{t}, \underline{I}), (\bar{t}, \bar{I})\}$ 给地方政府，高效率的地方政府选择第一个契约，低效率的地方政府选择第二个契约。由于中央政府能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所以它提供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将刚好等于地方政府的付出，具体说来，

$$\underline{t} = C_{\underline{I}}\underline{I}, \quad \bar{t} = C_{\bar{I}}\bar{I}.$$

对中央政府来说，它的决策就是要最大化其收益：

$$\max \quad \phi = S(I, r) - C_I I.$$

求解这个无约束最大化问题，我们得到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 S}{\partial I} = C_I, \quad \frac{\partial S}{\partial r} = C_r.$$

在完全合约的情况下，这两个式子就给出了最优投资水平，投资水平不存在扭曲。

我们进一步放松假定，考察在一个信息充分但是存在寻租的环境下投资水平的决定。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信息充分，但是这也不能排除有寻租的假设。因为这两者是根源于不同的假定，信息是否充分来自客观约束，但是寻租是否存在却来源于制度性约束。正是由于这两者来源于不同的假定，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即使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做了有害于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是会有一定限度内容忍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当更换一个地方政府官员所发生的成本超过了此官员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损失的时候，中央政府就

会容忍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与在完全信息情形下一样,中央政府能准确地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并支付其相应的报酬。此时中央政府的行为就变成了最大化下列效用函数,即

$$\max \varphi = S(I, \theta) - t(1+r).$$

求解这个最大化问题,我们得到:

$$S'(\bar{I}) = C_I(1+r), \quad S'(I) = C_I(1+r).$$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 $r > 0$, 和完全情形相比,两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完成的投资额都产生了向下的扭曲,而且这个扭曲会随着寻租率的增大而产生进一步的扭曲。这是因为: $\frac{\partial \varphi}{\partial r} = -\theta I = -C_I I < 0$ 。由于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中央政府也能预计到这一点。它会本能地收缩投资,只有收缩投资才能提高投资效率。随着寻租活动的进一步严重,中央政府对投资的收缩就会进一步加大,最极端的情形就是收缩所有的投资,致使投资额为零。但是,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会预计到中央政府在无法容忍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时将停止所有投资,地方政府所赖以进行寻租的投资活动就会完全停止,地方政府的收益也会趋向于零,所以地方政府会取一个适当的寻租比率。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投资会收缩,但是不会完全停止。

再进一步放松假定。假定信息不对称,而且还存在寻租,我们将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决定情况。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会有信息租金出现了,因为高效率的代理人总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的代理人,从而获得超额好处(拉丰、马赫蒂摩,2002)。我们定义信息租金为:

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信息租金为

$$\underline{U} = (1+r)\underline{t} - C(\underline{I}, \underline{\theta}).$$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信息租金为

$$\bar{U} = (1+r)\bar{t} - C(\bar{I}, \bar{\theta}).$$

定义参与约束条件为

$$\underline{U} \geq 0, \quad (1)$$

$$\bar{U} \geq 0. \quad (2)$$

即要想使地方政府都参与到投资活动中来,那么它从此项投资活动中得到的好处至少要能覆盖掉成本。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总是有积极性模仿低效率的代理人,从而获得一个正的信息租金。因此,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激励兼容约束条件,此条件确保了给定类型的地方政府模仿其他类型的地方政府所得到的好处不会多于不模仿的好处。表示如下:

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

$$\underline{t}(1+r) - C(\underline{I}, \underline{\theta}) \geq \bar{t}(1+r) - C(\bar{I}, \underline{\theta}).$$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

$$\bar{t}(1+r) - C(\bar{I}, \bar{\theta}) \geq \underline{t}(1+r) - C(\underline{I}, \bar{\theta}).$$

用信息租金的表示法来改写高效率地方政府的激励兼容约束条件，变成：

$$\underline{U} \geq \bar{U} + \Phi(\bar{I}), \quad (3)$$

其中 $\Phi(\bar{I}) = C(\bar{I}, \bar{\theta}) - C(\bar{I}, \underline{\theta})$ ，容易推知： $\frac{\partial \Phi(\bar{I})}{\partial \bar{I}} > 0$ 。

$$\bar{U} \geq \underline{U} - \phi(\underline{I}). \quad (4)$$

其中， $\phi(\underline{I}) = C(\underline{I}, \bar{\theta}) - C(\underline{I}, \underline{\theta})$ 。此时投资的决定水平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优化问题的解了。即：

$$\begin{aligned} \max \quad \varphi = & v\{S(\underline{I}, r) - C_{\underline{I}}\underline{I}(1+r) - \underline{U}\} + (1-v)\{S(\bar{I}, r) \\ & - C_{\bar{I}}\bar{I}(1+r) - \bar{U}\}, \end{aligned} \quad (5)$$

S. T. 式 (1), (2), (3), (4)。

v 为中央政府对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一个先念概率。整理 (5) 式得到：

$$\begin{aligned} \max \quad \varphi = & v\{S(\underline{I}) - C_{\underline{I}}\underline{I}(1+r)\} + (1-v)\{S(\bar{I}) \\ & - C_{\bar{I}}\bar{I}(1+r)\} - \{v\underline{U} + (1-v)\bar{U}\}. \end{aligned} \quad (5')$$

前面说是在考虑到寻租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期望收益，后面一项说的是两类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的均值。我们假定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条件为紧约束条件，即信息租金为零，

$$\bar{U} = 0. \quad (2')$$

因为假如信息租金不为零的话，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总是会模仿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从而获得一个超额好处，因此只要中央政府减低对低效率政府的投资量就能规避这一额外损失。

(3) 式就可以化为 $\underline{U} \geq \Phi(\bar{I})$ 。考虑到中央政府要最小化各类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而言也不例外，因此，(3) 式也是紧的，即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信息租金为 $\Phi(\bar{I})$ ，即

$$\underline{U} = \Phi(\bar{I}), \quad (3')$$

把 (2') 和 (3') 带入 (5')，得到

$$\max \quad \varphi = v\{S(\underline{I}) - C_{\underline{I}}\underline{I}(1+r)\} + (1-v)\{S(\bar{I}) - C_{\bar{I}}\bar{I}(1+r)\} - v\Phi(\bar{I}),$$

S. T. (4)。

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我们先求解无约束条件下的解,再检验是否满足(4)。

求解一阶条件得:

$$\frac{\partial \varphi}{\partial \underline{I}} = v \left\{ \frac{\partial S}{\partial \underline{I}} - C_I(1+r) \right\} = 0,$$

$$\frac{\partial \varphi}{\partial \bar{I}} = -v \frac{\partial \Phi(\bar{I})}{\partial \bar{I}} + (1-v) \left\{ \frac{\partial S}{\partial \bar{I}} - C_I(1+r) \right\} = 0.$$

因此对高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满足如下的条件:

$$\frac{\partial S}{\partial \bar{I}} = C_I(1+r), \quad (6)$$

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满足如下的条件:

$$\frac{\partial S}{\partial \bar{I}} = C_I(1+r) + \frac{v}{1-v} \frac{\partial \Phi(\bar{I})}{\partial \bar{I}}. \quad (7)$$

我们来检验上述结论是否满足约束条件(4)。

把上述结论代入约束条件(4),我们实际上只需检验如下的结论成立即可:

$$\Phi(\bar{I}) - \Phi(\underline{I}) \leq 0,$$

从上面已经知道 $\Phi(I)$ 为 I 的增函数。考察斯彭斯—米尔利斯,这相当于要求 $\bar{I} < \underline{I}$ 。而这显然成立。因此,从上式的中央政府最优化行为中得出来的解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

对照(6)式和和信息对称但是有寻租发生的情况之下的高效率地方政府的一阶条件,我们将会发现,这两者其实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对中央政府而言,当它面对的是高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时候,信息结构的特点本身对其效用的影响已经不是太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有没有寻租。但是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最优决策就是缩减投资。对照在信息对称但是有寻租发生情况下的一阶条件,我们将会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将会进一步降低。随着高效率地方政府的比率 v 的进一步增大,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将会降低。最极端的情况就是 v 趋向于 1 的时候,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将会倾向于 0。

三、中央政府的两难选择:重复建设的发生机制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存在寻租的情况下,两类地方政府的投资额都会向下扭曲,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扭曲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对于低效率的地方政府。在标准的委托代理框架下,当从高效率地方政府

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从两类政府所得到的均值的时候，中央政府就应该停止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即当

$$\begin{aligned} & v\{S(\underline{I}) - C_I \underline{I}(1+r)\} \\ & \geq v\{S(\underline{I}) - C_I \underline{I}(1+r) - \Phi(\bar{I})\} + (1-v)\{S(\bar{I}) - C_I \bar{I}(1+r)\} \end{aligned}$$

成立时，中央政府应该停止对低效率的地方政府投资。但是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话，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假设，而且这个假设是非常具有刚性的。那就是无论地方政府是多么的无能，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不提供投资，因为它要维持当地居民对中央政府的适当的满意度。而地方居民对中央政府的适当的满意度的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当地的投资，因此，当地方居民面对一个无能的地方政府时，当地居民不会把怨气全发在地方政府的身上，却会把这个怨气发在中央政府的身上。当中央政府面临这个刚性约束的时候，它就不得不提供适度的投资给地方政府，无论它有多么无能。

在公用事业已经高度民营化的国家，公共品很多由市场的手段解决。所以中央政府在面临无能的地方政府的时候，中央政府将有更多的解决办法，它所面临的约束也要软得多。因为即使中央政府提供非常少的投资，但是地方的公共品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但是对政府投资主导型的国家（比如中国）来说，公共品的提供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市场化的程度非常低，因此中央政府面临的选择就要少得多。

我们假定就全国而言，有一个居民最低满意度所要求的最小投资额，即低于这个投资额的时候，居民就会非常不满，对社会稳定会带来威胁。我们假定这个最小投资额为 I^0 。如果在向下扭曲的投资量都还大于社会满意度所要求的最小投资额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激励去提供额外的投资给地方政府。但是如果中央政府预期到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而导致均衡的总投资量向下扭曲，使其小于 I^0 ，即如果 $\bar{I} + \underline{I} \leq I^0$ ，则中央政府将会追加 $I^* = I^0 - (\bar{I} + \underline{I})$ 的额外投资给地方政府。在本文中，我们的意图是说明重复建设的发生机制，因此就不具体细分追加的投资额如何在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却非常容易从下面的分析中推出追加投资的分配办法。

对地方政府来说，当中央政府给一笔投资额的时候，它会有许多种投资选择，它既可以就已有项目进行重复投资，也能对一些尚未存在的项目进行创造性投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假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地方政府在面对创新时所要承担的成本。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如果要创造性地进行投资的话，地方政府会花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去进行调研等等活动。而且，对成熟项目的投资，各地都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技术的外溢性特点照搬已有经验。但是对需要自己开拓的项目就会存在许多成本。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我们假定这个成本为学习成本，并且是成本的平方，即

$L^2(I^d)$, I^d 为投资于其他的不同于现有投资的投资。并且 $L > 0, \frac{\partial L}{\partial I^d} > 0$ 。

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变成了:

$$U = (1+r)t - C(I, \theta) - L^2(I^d).$$

约束条件为: $\bar{I} + \underline{I} + I^d = I^0$ (我们只考虑约束为紧的这种情况, 如果不紧的话, 可以非常轻松地利用人工变量把它变成紧的约束, 使用库恩—塔克方法求解), 此时的投资决策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化问题:

$$\max \quad \xi = (1+r)t - C(I, I^d, \theta) - L^2(I^d) + \lambda(I^0 - I^d - \bar{I} - \underline{I}),$$

令
$$\bar{I} + \underline{I} = I'$$

求解一阶条件:

$$\frac{\partial \xi}{\partial I^d} = -\frac{\partial C}{\partial I^d} - 2L \frac{\partial L}{\partial I^d} - \lambda,$$

$$\frac{\partial \xi}{\partial I'} = -\frac{\partial C}{\partial I'} - \lambda,$$

化简得到:

$$\frac{\partial C}{\partial I^d} + 2L \frac{\partial L}{\partial I^d} = \frac{\partial C}{\partial I'}. \quad (8)$$

(8) 说明了投资于已有投资的边际成本已经大于投资于创新投资的边际成本, 从而对已有项目的重复投资发生了。这就说明, 在有创新成本的假设下, 地方政府把投资投向已有的项目将是一个最优化行为,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 却造成了在投资上的重复, 浪费了投资。从 (8) 也可以看出, 投资于创新投资的边际成本要小, 投资于创新投资将会提高社会福利。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创新投资就是因为投资于创新项目的创新成本由地方政府自己承担了, 但是改善的却是社会的福利。

现在有一种误解, 认为重复建设就是过度投资, 但是从我们的模型里可以看出, 在总的投资量只是达到社会最低满意度所要求的投资的时候就已经可能发生了重复建设。这个投资不是社会最优投资, 它有一个向下的扭曲。因此, 我们就看到了在像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投资主导型的国家里, 重复投资和投资不足奇怪地共存。

那么, 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把至少相当于 I^0 的投资直接投给地方政府呢? 中央政府也能预计到地方政府会进行重复投资, 它为什么还要让重复建设发生呢?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考察在信息充分但是存在寻租的情况下的中央政府的最优化行为:

$$\max \quad S = S(I, \theta) - \theta I(1+r),$$

对 r 求导，

$$\frac{\partial S}{\partial r} = -\theta I. \quad (9)$$

可以看出，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对中央政府有一个负的边际效用，对于寻租行为，中央政府的一个反应就是缩减投资。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由 (5) 式可得：

$$\frac{\partial S}{\partial r} = v C_I I + (1 - v) C_I \bar{I}.$$

从这个关系式可以看到，寻租对中央政府的边际效用等于两种类型的地方政府贡献的均值。和 (9) 式相比，我们可以看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对中央政府的边际效用为正。这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能识别地方政府的类型，所以容许地方政府寻租反而对中央政府的效用有一定好处。因为寻租会为地方政府努力进行投资提供额外的激励，而投资额的完成多少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效用。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重复建设虽然发生了，从社会范围来看，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它实际上是在以有重建建设发生的总投资额来换取居民的支持，因为对地方居民来说，公共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多多益善，重复建设引致的成本还会有其他的地方一起承担。中央政府也会预料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投资从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从政治过程上看却是有效率的。

四、结 束 语

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这种宏观调控是以直接关停所谓的重复建设项目为特征的。但是，在讨论重复建设的危害时，人们并没有区分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在重复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而且，在讨论重复建设的时候，人们往往直接把它等同于过度投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重复建设完全可以在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发生。

参 考 文 献

- [1] Bardhan, P.,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 1320—1346.
- [2] Buchanan, James, "Rent Seeking, Non-Compensated Transfers, and Laws of Succe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XXVI (1), 71—86.
- [3] 曹建海, "怎样避免重复建设的恶性循环——评魏后凯主编的《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一书", 《经济研究》, 2002 年第 9 期, 第 81—84 页。
- [4]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Maskin, Eric,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5, 62 (4), 541—556.

- [5] Huang, Haizhou and Chenggang Xu,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R&D Investment" *Mime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998.
- [6] Kornai, Janos,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 [7] Kruger, An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 291—302
- [8] Leff, N. 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6, 8(3), 8—14.
- [9] 马赫蒂摩·拉丰, "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10] Li, D. D., "Changing Incentive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 393—397
- [11] Lin, J., Yifu, and Guofu Tan,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426—431.
- [12] 陆丁, "寻租理论", 载汤敏、茅于軾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13] Maskin, Eric,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2), 421—425.
- [14] Murphy, Kevin,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2), 409—414.
- [15] 缪勒, "公共选择理论", 杨春学等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 [16] Posner, Richard, "The Social Costs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 83 (4), 807—827.
- [17] Qian, Yingyi and Rolan, Gérar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 1143—1162.
- [18] Rose-Ackerman, Susan, "When is Corruption Harmful?"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s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1996 (August).
- [19] Tullock, Gordon,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67, 5, 224—232.
- [20] 魏后凯, "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21] 卫新华, "重复建设与市场建设", 《中国经济评论》, 2003年第4期, 第4—11页。
- [22] 张曙光, "腐败和贿赂的经济分析", 载《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petitive Investment: A Model

PEIHONG YANG

(Unirul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efine repetitive investment as those led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analyze investment under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the existence of rent-seeking activities. We find that rent-seeking leads to a lower investment level compared with social optimum. We also find a situation in which investment is below the optimal level but repetitive investment still exists.

JEL Classification P16, P26, P27